

邵洵美与复旦教授们的交往

■读史老张



▲全增嘏

▲贾植芳

▲邵洵美

▲许国璋

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和出版家邵洵美(1906-1968)素有“文坛孟尝君”之称,他热情好客、人缘广、朋友多。近日检索邵洵美的朋友圈,发现他与几位复旦大学教授有过交往,这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在邵洵美交往的复旦教授中,有不少是他多年的好友,他们经历相当、志趣相同,热衷于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,全增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全增嘏1923年起先后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,1942年8月到复旦外文系任专任教授。他与邵洵美相识较早,曾是邵洵美出版的各类中英文刊物的撰稿人。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访沪,邵洵美参与了接待,全增嘏也在文化界人士的欢迎行列中,他后来据此写下《关于萧老头子》一文,犀利而幽默。

在邵洵美的朋友圈中,全增嘏的地位很高。1934年,邵洵美在《感伤的旅行》一文中,写下了他离沪后牵挂的“几个相熟的朋友的名字”,除已故的徐志摩外,他惦记着潘光旦、林语堂、郁达夫、谢寿康和叶灵凤等人的住所和行踪,唯有在提及全增嘏时,邵洵美饱含深情地写道:“增嘏是不是仍旧肯放声笑?”这种友情,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。那时,邵洵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,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,因身边缺少资料,他写信求助于在复旦任教的全增嘏,全增嘏不厌其烦,将复旦图书馆有关藏书“抄示”,邵洵美非常感动:“今日得回信,十分欣慰,增嘏诚老友也!”

李青崖先生也是邵洵美的好友。他1912年毕业于比利时列日大学,后任复旦中文系专任教授。他是最早翻译莫泊桑小说的翻译家之一,也是邵洵美主办刊物的撰稿人,曾任《论语》杂志主编。据邵洵美在《天生的诗人——我的爸爸

邵洵美》一书中记述,1933年邵洵美搬家到杨树浦麦克利克路(今临潼路)后,李青崖与全增嘏、温源宁等教授经常去邵家打桥牌,并常到附近的网球场打球。“他们几乎每隔三天来聚一次,有时相约去市里西康路(现五四中学操场)打网球。”抗战胜利后,李青崖十分忙碌,“他一个星期里三天在上海复旦大学执教,还要编《论语》;三天则必须去南京中央大学授课,往来沪宁之间,非常吃力”。后来,他被迫辞去了《论语》主编一职。

1946年8月,全增嘏任复旦外文系主任。可能因为这个原因,邵洵美与另几位外文系教授关系也比较热络,顾仲彝和冒效鲁等先生经常到邵家串门。外文系讲师许国璋也是邵家常客,他比邵洵美小九岁,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,是钱锺书先生的得意门生,应该算是邵洵美的学生辈。

邵洵美对于许国璋一直很器

重,他主办过一份《自由西报》,许国璋是他任用的四大编辑之一。1947年,邵洵美亲自签批许国璋赴英留学(当年中英文化基金会每年向一名中国学者提供赴英留学奖学金,邵洵美是该基金会成员,具有签字决定权)。许国璋留学期间,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,并通过邵洵美认识了美国女作家项美丽,曾在她伦敦附近的家中小住。

关于邵洵美与许国璋的交往,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。钱锺书的小说《围城》中,有一个人物叫赵辛楣,与上海话“邵洵美”是谐音。邵洵美在《天生的诗人》一书中写道:“当时许国璋因作者给这个人物取这个名字很不以为然,责问钱锺书。两人发生争论。”这一细节,固然反映了许国璋对邵洵美的感恩之情,但我始终未找到“两人发生争论”的出处。许国璋在晚年写的《回忆学生时代》一文中,充满了对

钱锺书先生的敬仰和爱戴;钱锺书的另一位学生许渊冲先生回忆时也说钱锺书很喜欢许国璋:“因为许国璋写文章有些学他,钱先生曾说:许国璋的英文写得比王佐良好。”在他们的回忆里,丝毫找不到“两人发生争论”的痕迹。

邵洵美与复旦中文系的另几位教授也有交往,用贾植芳先生的话来说,那“纯然是偶然的机遇”。1952年,在作家韩侍桁请客的宴会上,邵洵美与贾植芳初次见面,同时还见到了贾植芳的中文系同事刘大杰和余上沅先生。1954年,他们又在韩侍桁家中相会。贾植芳后来说:“这两次相会,大家都是天南地北地闲聊,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。”

邵洵美与贾植芳的第三次相遇出人意料,富有戏剧性。据贾植芳回忆,1960年冬,因“胡风案”被捕的他在狱中见到了邵洵美,邵洵美郑重其事地嘱咐他:“我有

两件事,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,替我说几句话,那我就死而瞑目了。”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访沪期间,邵洵美参加了“功德林”的欢迎晚宴,并花费“四十六块银元”为之买单,但当年大小报纸只写蔡元培、宋庆龄、鲁迅、杨杏佛和林语堂等出席宴会,唯独不写他的名字,这让他“一直耿耿于怀”;另一件事,鲁迅先生说邵洵美是“捐班”,文章“是花钱雇人代写的”,让他觉得委屈,“这真是天大误会”。1989年,贾植芳写下《我的难友邵洵美》一文,披露了这两件事,完成了邵洵美的嘱托。

以上几位复旦教授,都是邵洵美的同行,他们之间的交往,符合“嘤其鸣矣”“惺惺相惜”的文人传统。不过,邵洵美结交的另一位复旦教授吴钧和先生就显得比较“另类”——他不是作家、翻译家或文史学家,而是一位化学家。吴钧和早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化工系,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化学,获博士学位。1949年夏,他任复旦农化系(后为化学系)教授。

当年,吴钧和的住处离邵家很近,经常来拜访邵洵美,他的话自然离不开化学,谈着谈着,竟引起邵洵美的共鸣。邵洵美忽然决定,办个化工厂试试。他投资一万美元,聘请吴钧和为工程师,办起了立德化工厂。化工厂设在虹桥前怡和洋行大班哈特门的花园别墅(哈特门离沪前交由邵洵美处置)。自从开办化工厂后,这幢花园别墅就不再有鸟语花香,整天弥漫着一股化学气味。但是,邵洵美对于化工根本就是外行,立德化工厂很快就倒闭关门,以8000元人民币盘给了别人……

现在看来,邵洵美与几位复旦教授的交往,很像他办化工厂,一度率真热情,炽烈如火;最终烟消云散,寂寂无声。但是,邵洵美曾经发出的光和热,一直温暖着他的复旦朋友们。

谁“护送”胡适离开北平

■李传玺

1948年11月29日,平津战役打响,12月15日,北平被解放军包围。虽然此时毛泽东对他的老师胡适放出话来,说只要胡适先生留下来,就让他当北平图书馆馆长。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,离开了北大。

关于胡适离开北平,他自己记有日记:(1948年12月14日)早晨还没有出门,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,力劝我南行,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,我说,并没有机来。十点到校,见雪屏电:“顷经兄又转达,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,万勿迟疑,当有人来洽机,宜充分利用。”毅生(郑天挺)与枚荪(周炳琳)均劝我走。我指天说:“看这样青天无片云,从今早到现在,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,飞机已不能来了!”我十二点到家,又得电报,机仍无消息。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,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。后来我们(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)因路阻,不能到机场。

(1948年12月15日)昨晚十一点多钟,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,说总统有电话,要我南飞,飞机今早八点可到。我在

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,他很能谅解。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。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,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,三点多到南苑机场,有两机,分载二十五人。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,晚六点半到,有许多朋友来接。儿子思杜留在北平,没有同行。(《胡适日记全集》第七卷)

过程写得很明白,讲得也很平静,完全是一副积极配合急迫想走的样子。

但真的如此吗?其实不是,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,他就是“赫赫有名”的军统特务叶翔之。

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“百年冥诞”文集,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,文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三十七年冬,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,安然返京,不一周北平即陷于‘匪’手。”(该书第181页)那么是什么工作呢?此书开篇是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,第三节“叶在大陆屡建奇功”对此有所交待:“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,经办过好几件大案,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,冒险深入城内,接出胡适、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。”

叶翔之是什么人?“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,身兼军统局‘渝(重庆)特区区长’,局(后改为保密局)本部第二处处长、全国肃‘奸’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”。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“北平共谍案”,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,北平、西安、沈阳、保定、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,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,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,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。这之后,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,“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,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,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,全部被捕”,工委书记、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,吴石、朱谌之等牺牲。

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,胡适想不走行吗?其实胡适日记也隐藏着有人来“护送”的蛛丝马迹。最初突然通知胡适的是陈雪屏,陈雪屏曾任北大训导长,此时出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,他电报的第一句话“顷经兄”,“经”就是蒋经国,此时蒋经国已开始逐渐掌控情报系统,电报中那句话“有

人来洽机”,就是表示国民党要派人来“护送”他们走,再结合“万勿迟疑”“宜充分利用”,这一方面表示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对胡适的重视,一方面也隐含着他们对用军队系统“护送”的不放心,是不是还隐含着万一这些人不愿走,有留下来等待共产党的倾向,就给予就地处理的秘示呢?

对叶翔之来说,这本是件“光荣”的事,后来的自述应该能清楚说明这件事,可为什么仍要说是“特殊工作”呢?傅斯年就公开说过他这位老师处理事务的能力很差,14日下午,胡适从一点半到三点,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,用这么短的时间把离家的事处理好然后离开,如果没有人帮忙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
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,这期间因批评国民党人权与约法问题遭到国民党当局猛烈围攻,只好离开上海中国公学返回北大。他是1930年11月28日搬家离开上海的。那天他的日记记得很平静,可跟随他的罗尔纲后来却说情况其实十分险恶,国民党特务的枪口暗中可能随时会将他们打死。离开北平的这一次他的日记仍然记得很平静,通过近些年国民党老特工们的回忆,可以看出那天胡适离开北平仍然充满着危险,表面上是保护他们平安离开,实际上枪口仍然随时会对准他们,只要他们哪怕表露出一点点不愿意。